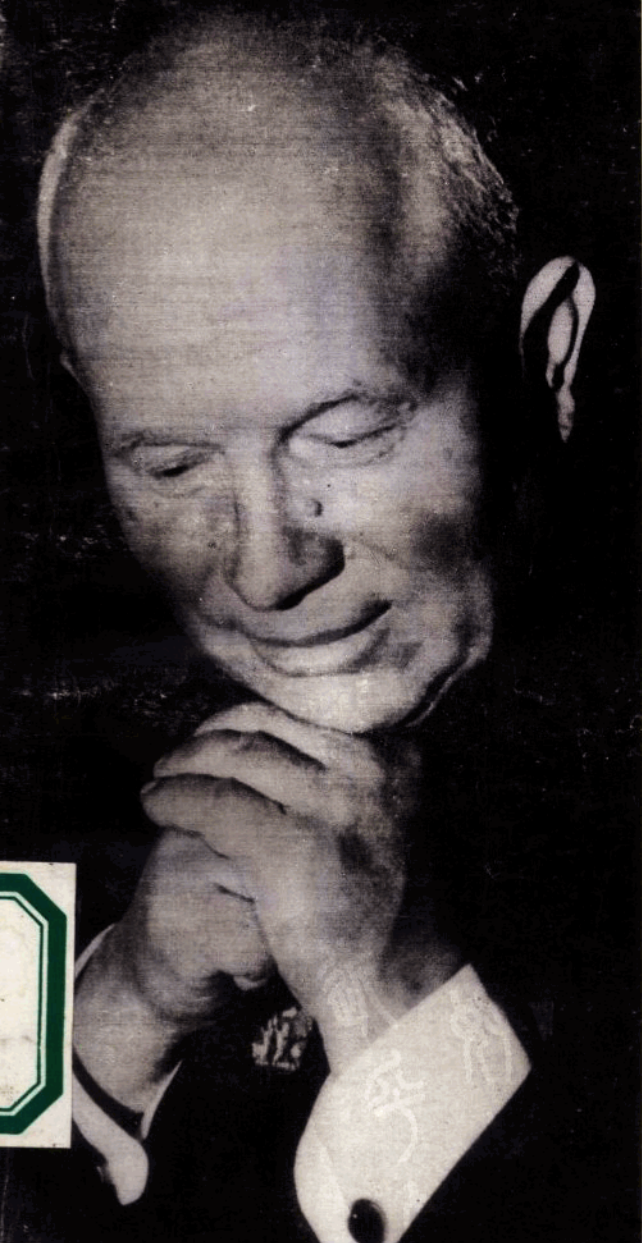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



本文译自俄文《星火》杂志

ОГОНЁ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40—43 ОКТЯБРЬ 1988

(原题为 Пенсионер)

СОЮЗКОГО ЗНАНИЯ.



尼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全家合影。(左起)阿历克谢·阿朱别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女儿叶莲娜和拉达；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孙子阿辽沙、尼基塔和万尼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儿子谢尔盖；儿媳加林娜；孙子尼基塔。

摄于1963年

前 言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知道，用真正的历史主义精神去感受过去时代的气息，去了解那时某些个别人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日记、目击者的记述、回忆录……这些材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多么必要。因为通过这些材料，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地去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要知道，对过去回溯得愈远，我们所拥有的原始资料愈少，对了解那些极其遥远的过去的人和事，这类材料就尤其显得重要。

说来也怪！即使距今才仅仅50年、40年、30年或20年的那个时期，即使有堆积如山的史料，如果没有原始资料，实际上也是不能了解那段历史的。翻阅一下报纸的合订本，很容易找到官方材料。但是这些材料中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呢？例如，在苏联社会历史极其悲惨的那些年代中，整天价叫嚷什么“生活变得更好，生活变得更愉快”。事实上，当时几乎占人口1/10的所谓生活得更好更愉快的人却成了人民的敌人。要不，就胡扯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停滞和危机加剧的年代，

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

像波考古学家在若夫哥罗德发现的写在桦树皮上的文字一样，像8世纪或10世纪初人们留下的珍贵的日记一样，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目击者或事件参与者的记述来恢复我们历史的本来面貌。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本人的主观态度——他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自己的观点和意识的局限（我这里不是说他们故意偏离了“只有绝对真实，全都是绝对真实；除绝对真实之外，再没有什么”的原则）。现在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有关我们前不久的历史资料，每个读者都有权甚至应当对所读到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自己进行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这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然而这事还是要做的。唉，很遗憾：臆测、传闻、推想往往顶替了作者对事实的正确认识。而某些人极为轻率地提供给读者的某些东西却是以确实无疑为名的。譬如：有这样的报道：“尼·谢·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由皮尔蒙大飞往莫斯科途中，似乎曾问过驾驶员可否在基辅降落。”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提供给读者的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的日记是在30年代后期写的。它的特殊价值恰好就在于此。要知道回忆录，特别是今天写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当前社会思潮的烙印。已写出的这些日记是所谓只宜放在书桌里，而无论如何也不宜于发表的东西。回想起来，在那个时期能够发表的向来只能是一些同苏斯洛文观点一个模式的阉割真理、故

想回避事实、公然捏造事实的很少考虑我们的历史科学和读者兴趣的作品。读者不必怀疑日记作者本人的真诚，自然，这里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主观见解。依我看来，报道的事实，依然是主观的，但观点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资料的解释，是每个人读了之后自己的事。但根据我的意见，它确实是事实，并且也很有价值。

我想象得到，谢尔盖·赫鲁晓夫能够把这个有关我们不久前的历史时刻，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转折关头的几乎像侦探小说一样的故事付诸发表是很不容易的。在阅读面前出现的其中也有一些小人，会耍小动作，他们能够影响改组过程，使它不可逆转。

一些偶然的事情逐渐演变成成为某些重大事件的中心，它们在这些事件中起了某种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令人惊讶地确信那些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智慧和高度公民觉悟的人的天真，这令人亲眼目睹了阴谋战胜理想（同时也令人明白了正是历史形成的错误才使得这种阴谋得逞），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促使善于思考的人们拿起笔来。

作者是工程学博士，电子学和管理学工程师，他没有妄想对社会的“管理体制”进行概括和得出结论。这项任务不是一个人或一年所能完成的。这儿有的是作者最大的诚挚，他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对这些材料所做的细心比较，在历史主义和对当时条件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平静分析，完全没有骑兵式的无理而粗暴的攻击，耸人听闻的东西，粗枝大叶的

态度，自以为通晓一切的行为，也没有在回首可怕而荒诞的过去时今天所表现的那种勇气……请允许我重复一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历史学博士 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米高扬^①

^①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之子。

第一章

夏天过去了。天气日渐凉爽，树上的叶子也开始发黄。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已将近10年。

关于1964年收成问题的麻烦事刚结束，父亲就去农业地区视察，因为他想亲眼看看事情的进展情况。他从来都不轻率地相信州委书记们的报告。

国家很需要一个好收成，去年由于干旱粮食歉收，不得不用黄金从美国购买谷物。

1964年预定的国外访问已经结束，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受到纳赛尔总统的热情接待，他还访问了斯坦的纳维亚国家。

父亲原打算在秋天稍事休息，好集中一下思想以便拟定未来的计划。考虑的事情很多：在11月至12月之间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例会，会上将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业的状况。10年来农产品的生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效益远未达到父亲所期望的那种标准水平。从国外引进的综合农场的全套设备，在我国条件下不能保证该公司所许

诺的产量。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干部政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趋高龄化，它的大部分成员的年龄都已接近60岁，而我父亲则刚刚庆祝过他的70岁生日。他经常反复考虑：谁来接替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交给谁呢？斯大林死后，由于路线分歧，开始发生争吵和意见不一致，最后都以公开的你死我活的搏斗而结束。我父亲认为不能再发生类似情况，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立法形式建立领导干部轮换制，并加强它的公开性。如果说每个主席团成员都知道，姑且说，他的任期为两届（每四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一届），那他将会更多地考虑工作，更为果断地行动，而无须乎左顾右盼。这样，在中央委员会和州委中工作的正在成长着的青年一代将会看到自己的前景。

第22次党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党的领导干部轮换制的决议，但这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必须进一步将这些原则在新的宪法中固定下来。早就通过了制定新宪法草案的决议，也建立了相应的委员会，可是父亲总是无暇顾及这件事，总是被一些迫在眉睫、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挤掉。

考虑制定新宪法工作的最合适的时间就是他休假的时候。在那里，在皮聪大角，很少有火烧眉毛的事来干扰。当然，并没有掐断他的电话，并且送来的文件也占去了一些时间，可是，这难道能同在莫斯科时忙得团团转的情况相比吗？何况在这里的松林中思考问题效果也更好。

我听说过父亲的计划。在全会上准备首先扩大中央委员

会主席团的成员。近年来，一批像谢列平、安德罗波夫、伊里切夫、波利亚科夫、萨丘科夫、哈尔拉莫夫、阿朱别依这样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是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同志。他们热烈响应一切新的倡议，如饥似渴地领会精神加以发展，并立即提出一大堆新的建议。和他们一起工作使人感到更有意思，更加朝气蓬勃。实际上，在解决党和国家的许多事务中，他们发挥了不亚于主席团委员的作用，并相应地使当时更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形势成熟起来。何况这是一批即将来接班的年青人。但所有这一些想法都必须经过反覆斟酌。

很遗憾，在10月以前我父亲终于未能去休假。新的火箭技术的检阅自春天就已拖延下来，而马林诺夫斯基则一再催促，应当作出装备新的洲际导弹武器的决定。经过多次改期后，终于确定于9月份在一个发射场举行新型火箭武器的检阅。

和我父亲一起去参加检阅的应该有负责国防工业的政府官员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和乌斯金诺夫。在发射场迎接他们的有一些部长、军区司令和设计师。

到9月份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连最后一些细节也都安排妥当——包括将由谁陪同最高首长检阅等。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数超过检阅席位的好几倍，只好由中央委员会审查名单，而负责国防工业的伊万·季米特利耶维奇·谢尔宾就毫不留情地把多出来的名字划掉。

我非常希望能跻身于这些幸运儿之间，要知道在过去所

有各次检阅中，我都是新型军事技术的表演者之一。不久前刚刚完成了新的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现在要决定它的命运了，将听取赞成的人和反对者的意见并将作出批量生产的最终决定。

很高兴，我的名字留在名单上了。临行前的忙碌开始了。但是命运却常常作出了不符合愿望的安排。动身前几天我的腿痛了起来，起初我没有重视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过了几天我走路都困难了，只好去求助于医生。

“什么出差，根本连提都不用提。”医生连连挥着手说，“我们必须让你住院治疗。”

在争论了一会儿是否让我住院的问题后，决定让我在家里治疗。不过我自己也已明白，我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去发射场，也什么都干不了。

我的同事们在祝愿我早日恢复健康之后，都坐飞机走了，又过了两天，我父亲也跟着出发了。

我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忧愁地注视着窗外那阳光明媚的秋天。偶尔来个电话，我只能一瘸一拐地去接。

这样过了几天。发射场没有传来任何消息，的确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在发射场。

我感觉日渐好转，打算过几天就去上班。

我在列宁山上的家里一楼住了一套两间带个浴室的房子，它们好像是一套独立的住宅，门通向走廊。房子对面有一间宽敞的饭厅。全家人很少能坐到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只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才吃饭。也只有

晚上，当父亲下班回来，全家人才能短暂地聚在一起，喝喝茶，互通消息。随后父亲就拿起文件坐到一个没有放碗碟的空地方开始看文件。全家喝茶结束后，就开始晚上的工作。大家无声无息地互不干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或者各回自己的房间，或者默默地坐在这里的沙发和躺椅上看书或读报。

我有一个单独的市内电话和一个同住宅区值班卫队长联系的内部电话。父亲的专用电话则安置在饭厅旁边一间房子的屋角的专用小桌上，那儿有政府专用的电话，同样也有一般的市内电话及直通警卫值班室的直拨电话。父亲除非万不得已，很少使用这些电话，因为他认为，下班后，就应当让人们休息，而不要让在工作时间内能完成的事情去加重他们的负担。他特别不喜欢那些不遵守作息制度，在办公室滞留得很晚的人。这些都使他回忆起了通宵不寐的斯大林时代。

“你在傍晚下班时常常迟迟不走，这并不能说明你的工作勤勉，而只能证明你没有本领好好地安排工作。”他经常这样说，“工作日是7点结束。7点以后，你可以上剧院，也可以去散步，完全没有必要坐在办公室里磨破裤子。否则，你第二天也不可能精力充沛地工作。”

知道了这一点，除非非常紧急，人们很少往我们家里打电话交谈工作。政府专用电话每响一次，在我们家就是一次小小的事件，所有在场的人都留心倾听对话，试图从片言只语中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在我生病期间的一个晚上，政府专用电话响起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父亲不在莫斯科，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

我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可以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听电话吗？”

“他不在莫斯科。”我一边困惑不解地回答，一边思索这是谁往家里打电话。因为能够使用这个专用电话的人，他应该很清楚我父亲现在在那儿。

“那请问你是谁？”他紧跟着问道。

我感觉到对方问话的声音有些失望。

“我是他的儿子。”

“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对方急急忙忙地说。

“我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以前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①的警卫队长。从夏天开始我就一直在设法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取得联系，我必须向他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但怎么也联系不上。最后，我好不容易得到接近政府专用电话的机会，这才决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谁知道又是不走运。”

我感到很奇怪。这位伊格纳托夫的前任警卫队长同赫鲁晓夫能谈些什么呢？他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情况很不寻常。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加柳科夫怕我放下听筒，因而慌慌忙忙地说。“据我所知，一场反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

^①伊格纳托夫：当时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曾经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奇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他本人。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是从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个阴谋的，它牵涉到了各方面的人。”

“越来越不对头，”我想。“这大概是个疯子。眼下会有什么阴谋呢？简直是胡说八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应当告诉克格勃的谢米恰斯特内，像这一类的事情是归他管的，而且您本人也是在那儿工作的。他们会搞清楚的，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的。”我一边说着，一边为能摆脱目前的这种形势而感到高兴。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我不能去找谢米恰斯特内，他自己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一些人就是这个阴谋的积极参与者。所有这一切我想单独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现在正面临着危险。可现在您说他不在莫斯科，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请您过几天再打电话来。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尽力想安慰他。

“我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我侥幸碰上这个好机会，能够单独一个人在这间房子里使用专用电话。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而事情又非常重要。这是涉及我们国家安危的大事。”他说得很坚决。“可能的话，请您听完我所要讲的事情，以后再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转告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好不好？”

“您知道，我……我有些不舒服，”我慢慢吞吞、含含

糊糊地说，想延缓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是个疯子，只是用他喋喋不休的谈话、毫无根据的猜疑、不断的电话铃声来折磨我。那我干嘛还要去理他呢？……

可是万一他是个正常的人呢？万一他的消息中确有那么一丁点真实的成份呢？这样一来，我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宁而把他拒之门外吗？显然，我还是应当同他见一次面，去弄清这究竟是真话，还是病态的臆想。当然，父亲是无法忍受家里人干预国家事务的。如果我冒冒失失地说出这次谈话，虽然他平时对我很好，可我也难免会受到一次严厉的训斥。谈到新型导弹、燃料或变流器等问题时，我还勉强能行。可是现在却落得要我去触动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干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局外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禁区。

可万一这是真的呢？应当拿定主意。

在电话那一端的加柳科夫正等着我的答覆。经过片刻的犹豫后，我终于下了决心：

“好吧！请告诉我您的地址。我今天晚上去看您，您可以把一切告诉我。”

“不行，不行！不能到我这儿来。在我这儿谈话很危险。让我们在街上找个地方谈吧。您知道库图佐夫大街中央委员会的那幢大楼吗？就是您姐姐尤里雅住的那幢楼。请告诉我您的汽车是什么样子，我在拐角处等你。”

“我的汽车是黑色的，车号是02—32。请您等着，我过半个小时就到。”我回答说。

我们相互道了声再见。

我被弄得烦躁不安，在去换衣服的时候，还一边走一边使自己相信，整个谈话不过是病态臆想的结果，而在我回来的时候，可能只不过是惋惜损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但内心却是难以平静的……

我很快换好衣服，就走向大门旁边的车库，汽车停在那里。

值班军官习惯地打开把院子 and 大街隔开的高大的绿色大铁门。一切都同平常一样，不平常的只是这次出行的本身和它的目的。去的地方并不远，充其量不过15分钟。于是我在内心里开始集中思想，准备迎接这次谈话。

当时我不知道，关于正在酝酿事变的消息早已传到我姐姐拉达那里。1964年夏天就有一个女人给她打电话，她没有记住这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坚持要和我姐姐见面，声明说她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消息。拉达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她见面，这个女人失望之余，就在电话里说，她知道阴谋家们正在聚会的地方，并且知道他们正在讨论除掉赫鲁晓夫的计划。

“您为什么要找我呢？这是克格勃管的事情。请您往那儿打电话吧。”拉达回答说。

“连克格勃的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本人都参与了这些会议，我怎么能够往克格勃打电话呢？我想和您谈的正是这件